

世界经济“半外围区”的 “起飞”之路： 以德国为例*

忻 华

摘 要: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的霸权秩序,是互相牵制、互为因果、融为一体的。而连结“中心-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结构的“枢纽”,是“半外围区”里具有极其重要的安全战略价值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枢纽”之地往往成为霸权国的盟友,它们利用自身在霸权秩序中的特殊位置,获得独特而优越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比一般国家更容易实现经济“起飞”。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政治结构中先后出现三个霸权体系,其中第二个霸权体系中的德国,正是凭借世界经济结构与霸权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所提供的独特机遇与空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典型案例,能够清晰地表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与国际霸权体系之间互动博弈的演进模式。

关键词:“中心-外围”结构; “半外围区”; 霸权体系; 德国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 社科部 讲师 博士 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F130.41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8)04-0036-07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itman Rostow)首先提出了“起飞”的概念,用以表述一国从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持续20至30年,此时一国经济突破传统社会缓慢演进的轨道,进入持续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一国经济的“起飞”总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中实现的,其实现“起飞”的可能性及其路径选择,不仅受制于该国所能利用的生产要素的数量结构,而且受制于其所处的宏观经济与政治

结构。通过考察后发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心-外围”(Center-Periphery)结构中实现经济“起飞”的演进规律,我们发现,只有分析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互动结构的演进特点与规律,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一国实现经济“起飞”、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原因。

* 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亚太‘半外围地区’依附型发展的比较研究”的部分成果。

一、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结构互动博弈的枢纽： “半外围区”的理论定位

在阐述现代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时，“中心-外围”结构是常被提及的基本分析范式。这一范式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可分为富裕先进的“中心地带”和贫困落后的“外围地区”两大区域，资本和技术从“中心地带”向“外围地区”陆续扩散，而资源和利润则从“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带”源源汇聚；“中心地带”和“外围地区”之间的博弈关系，形成现代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而“中心地带”和“外围地区”之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则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中心地带”与“外围地区”的二元对立，成为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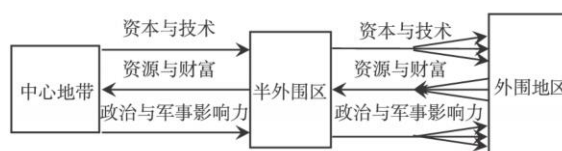
“中心-外围”结构的分析范式，源于“新左派”经济学家的著述。由于这一分析范式能够准确概括世界经济中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发达与不发达等二元对立的鲜明特征，因而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和接受，不再是专属“新左派”阵营的理论工具。不过，对这一范式的应用，目前很大程度上只是着眼于分析经济学视角的要素流转关系，局限于界定和廓清关于财富的互动关系。然而，财富的互动关系与权力的互动关系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宏观政治结构的演进，塑造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在面貌与基本架构。若不能厘清外生的宏观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与演变规律，则很难深入理解“中心-外围”结构的成因、特点与发展趋势。

源于地理大发现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和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都产生于同一个宏观历史结构，两者同时向外扩展，且互相影响。那么，一个问题由此产生：什么是决定“中心-外围”结构自身演变及“中心-外围”结构与国际政治结构的互动博弈关系的“枢纽”？

可以认为，这个“枢纽”存在于“中心-外围”结构的“半外围区”，是“半外围区”那些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安全战略价值的地区。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霸权国主导的现存政治秩序往往会受到那些不满现状的崛起强国的挑战。为了

应付这些挑战，霸权国往往会对“半外围区”给予特殊的关注，因为“半外围区”是世界经济中各类要素流动的中转站，是“中心”和“外围”之间承上启下的桥梁与纽带。在“半外围区”里，那些位于地缘战略要冲的国家与地区，往往获得霸权国的青睐，与霸权国缔结安全同盟，成为霸权国向“外围地区”投送力量、施加影响的“战略中转站”和“效力倍增器”。与“外围地区”和“半外围区”未与霸权国结盟的国家相比，霸权国在“半外围区”的战略盟友作为维系霸权体系的安全战略支柱，能够获得更为优越的发展机遇；它们往往能优先获得霸权国的资本与技术，实现超越常规的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经济“起飞”。

图1 半外围区的“战略中转站”与
“效力倍增器”的作用之示意图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演进，先后出现三个世界性的霸权体系，而霸权国主导的政治秩序和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应出现三次调整；而这三次调整中，霸权国在“半外围区”的这些战略盟友，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整个霸权秩序和“中心-外围”结构的面貌，影响和重塑了整个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

在第一个霸权体系中，霸权国荷兰为了对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野心勃勃的挑战，一度将“半外围区”的英国扶持为战略盟友。荷兰人将海上中转贸易积累的财富投资于英国的金融业，使英国获得独特的优势，最终在19世纪成为新的霸权国。在第二个霸权体系中，霸权国英国为了遏制野心膨胀的法国与俄国，刻意扶持“半外围区”里仍处于工业革命前夜的美国和德国，1812年后开始构建美英特殊关系，1815年与普鲁士缔结同盟条约，使这两国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20世纪中期英帝国解体，美国接替英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在第三个霸权体系中，美国为遏制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将世界经济

“半外围区”的韩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视作支柱性盟友,向其提供巨额援助,使其越来越深地卷入美国主导的贸易与金融体系,产生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故事。

自从第二个霸权体系,即“英国治下的和平”出现后,工业革命开始从英国向世界扩展,追求经济“起飞”,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几乎所有“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的发展目标。而霸权国在“半外围区”的支柱性盟友,则往往能借助与霸权国结盟形成的外部政治环境的有利条件,抢在“半外围”和“外围”其他国家之前,率先实现经济“起飞”,完成工业化。因此,当第二个霸权体系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时,“半外围区”的独特作用,特别是与霸权国结盟的“半外围区”支柱性盟友的枢纽作用,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第二个霸权体系中的德国,即属于此类率先“起飞”之行列中的典型案例,研究德国在特定的宏观政治结构中实现“起飞”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半外围区”在“中心-外围”结构中的独特地位。

二、从“维也纳体系”的夹缝起步:

1815年至1871年德国的崛起

1. “维也纳体系”主导的“中心-外围”结构

整个18世纪,英法两国在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争霸战争,彼此混战,难解难分。1814至1815年,经过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彻底失败,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完全瓦解,英国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海上贸易与殖民霸权,成为主导欧洲政治秩序的霸权国。1815年6月欧洲列强举行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欧洲外交的力量均势。在这一体系中,英国掌握主动权,充当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通过一系列同盟关系,维持着欧洲大陆列强之间相互制约的稳定局面。自1815年至1914年,“维也纳体系”作为英国主导、制约整个国际政治架构的霸权秩序,延续近百年,不仅使国际政治结构保持了百余年的相对稳定,也使英国借助工业革命而主导的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得以向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巩固和演进。1750至1800年间,英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达到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至1800年,英国已通过遍及全球的殖民体系和商业网络,

抢占世界经济之先机,牢固树立了自己在“中心-外围”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而拿破仑战争的结束,“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则促使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迅速发展,空前繁荣。经济学家芬德雷(Ronald Findlay)谈到,1820年后,由于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英国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出现了迅猛的加速运动,同时跨洲贸易也从1500年至1800年间年均1%的增长速度,一跃而提升到年均增长3.5%的速度。

2. 德国在“维也纳体系”和“中心-外围”结构中的位置

德国大部分领土处于中欧内陆,介于海外贸易高度繁荣的北海沿岸国家和相对封闭且工商业落后的东欧平原和南欧山地之间。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以英吉利海峡为核心的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先后步入工业革命的快车道,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时,德国因其处在欧洲大陆不偏不倚的地理中心,而成为整个“中心-外围”结构的“半外围区”。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奇波拉(Carlo M. Cipolla)等人谈到:“德国从来都不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真正中心……好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处于西欧和东欧的先进和落后的中间地段。”也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地理位置,致使德国受到外部势力的多方影响,长期四分五裂。直到19世纪初,德国仍是由数百个公国、邦国和上千个骑士领地构成松散的政治联合体,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也就难以取得大国的地位。德国史学家施纳贝尔(Franz Schnabel)谈到:“对德意志来说,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状况,它空间上的任何一点都没有提供一种地理上的优势,来确保它完整的政治统一和来自某一点上的优势。”在德意志境内诸多政治实体中,普

[英]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Ronald Findlay / Kevin H. O'Rourke, *Power and Plenty: Trade, 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22, 402.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王铁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2页。

Franz Schnabel, *Deutsche Geschichte in 19 Jahrhunderte*, Freiburg, 1964, 转引自李工具:《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鲁士相对而言实力较强,但与西欧强国和俄国比起来仍显虚弱,只能勉强挤进欧洲列强的行列。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都曾谈到,直到1815年,普鲁士在欧洲列强中仍是实力最弱者,与瑞典、西班牙等国相比并不具有明显优势。因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半外围区”的位置,以及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二流国家的地位,是德国在19世纪前半期走向“起飞”前的背景条件;而德国工业化的路径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在“维也纳体系”中的位置,特别是德国与英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互动关系。

3. “维也纳体系”中的英德同盟

这一时期的普鲁士与英国的政治同盟关系的建立,实际上为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的经济“起飞”铺平了道路,构建起安定的外部政治环境。从拿破仑时代到1870年前后,法国国内一部分强硬派政治势力始终怀有强烈的意愿,要挑战英国主导的霸权秩序。同时法国在1870年前是全世界仅次于英国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仍有强大的战争潜力。为了遏制法国对英国的潜在威胁,巩固英国业已建立的霸权秩序,英国不断靠近普鲁士,与其建立密切的外交联系,组建军事同盟,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扶助普鲁士。英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扶助普鲁士的举措表现在这样几点:

首先,在拿破仑战争后有关欧洲领土的安排中,英国帮助普鲁士取得不少实惠。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代表支持实力最弱的普鲁士,帮助其获得了萨克森1/3的领土和1/2的人口,并使其获得莱茵河左岸的大片领土。莱茵河左岸的这片领土涵盖鲁尔河流域,包括下莱茵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交通便捷,煤铁资源丰富,在大半个世纪后成为德国最主要的重工业区,即鲁尔工业区。

其次,在维也纳会议结束之际,英国与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在1815年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建立起正式的军事同盟。四国约定,定期会谈,彼此协调,并在必要时联合出兵,以消除法国对和平的威胁。这一条约正式确立了英国与普鲁士的同盟关系,并首创同盟各方定期会谈的外交机制,使普鲁士正式成为欧洲五大国之一,从过去二流国家的地位跻身于欧洲一流强国的行列,提升了普鲁士在

国际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再次,为制约法国,英国默许和支持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行动,接受乃至纵容德国的统一和崛起。英国的宽容态度,使普鲁士得以发动一系列王朝战争,在19世纪70年代顺利地统一了德意志各邦,建立起德意志第二帝国。德国史学家尼佩代伊(Thomas Nipperdey)谈到:“一个通过战争而得到加强的普鲁士是符合英国利益的,因为它能作为稳定因素对俄、法之间的权力均势发挥影响”。米尔斯海默也说:“英国与俄国事实上欢迎普鲁士的胜利,因为它们认为统一的德国符合它们的战略利益。两者都感觉到法国是欧洲最具威胁性的大国,法国旁边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将会有助于制衡法国……他们并不把普鲁士视作威胁”。德国的全面工业化是以德国的统一为基础的,而德国的统一,则离不开当时仍在主导世界政治结构的霸权国英国的首肯与支持,而英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实际上与法、俄两国对英国主导的霸权秩序的威胁密切相关。

4. 英德政治关系推动下的英德经济一体化

总之,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至1871年德国统一前,英国对普鲁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扶助,使其在英国主导的“维也纳体系”中获得了安定而有利的周边环境。同时,与政治和外交上的扶助相联系,英国在其主导的世界经济结构中,也在积极推动英德双边贸易,乃至促进英国对德资本与技术输出,使普鲁士和整个德国都能从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而形成的自由经济体系中受惠。德国,尤其是普鲁士,随着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日趋繁荣,加快了其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在19世纪中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在1870年以前,英德双边贸易,清晰地体现出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自15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天津编译中心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 - 1866*, München: 1983, S. 774, 转引自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第126页。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11页。

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与“半外围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英国对德大量输入工业制成品,包括纺织品和机械产品,为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当时英国输入德国的毛纱和棉纱,成为德国织布业最主要的半成品来源,李斯特(Frederick List)在1850年前后承认:“现在德国工业离开能完全供应国内市场的情况还很远”,“目前每年由英国输入的棉制品13000生丁纳,毛织品18000生丁纳,棉纱、棉线、麻纱500000生丁纳”,而这些是德国自身不能制造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兰迪斯(David Landes)谈到:“直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德国才开始摆脱对英国进口毛纱的依附地位。”奇波拉等人也曾谈到:“不列颠和其他西欧国家销售商的效益对德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直接有利的。1849年,德国织布业使用的棉纱62%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同时,英国向德国输入的机械制品,则为德国的交通体系与重工业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手段。奇波拉等人强调:“不列颠的资本货物在德国工业建设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德国从1835年修筑第一条铁路起就主要使用不列颠的机车、火车和铁轨。”而李斯特则谈到:“英国运销德国的工业品,比运到它所竭力称道的印度帝国去的,还要多十倍。”

另一方面,在英国与普鲁士的同盟关系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英国走上自由贸易之路,对德国农产品敞开市场,使德国通过对英出口农产品积累了工业化所需之资本。自19世纪初开始,随着英国与普鲁士的关系日益密切,德国取代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成为英国输入的农产品的主要来源地之一,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容克贵族,通过对英出口粮食获取了丰厚的收益,为日后投资工业积累了资本。李斯特承认:在英国废除《谷物法》(The Corn Law)之前,德国向英国输出的粮食和木材,在德国对外出口中就已占据重要地位,“普鲁士的利益要求输出谷物与木材”。兰迪斯则谈到:“谷物是普鲁士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地区是联合王国粮食的主要供应地”。自19世纪初开始,英国的工业生产商强烈要求取消限制农产品进口的《谷物法》,以降低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进而增强工业出口能力;而同时普鲁士在1834年主

持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统一了从德意志境外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与英国和普鲁士日益密切的政治关系相联系,双边经济合作也在发展。英国希望与德意志关税同盟缔结协定,为英国工业品对德出口取得优惠条件;而普鲁士官员则要求英国“必须首先降低它的谷物税,因为谷物税比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制造品税更不合理。”英国最终在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向普鲁士容克贵族敞开了农产品市场,相应取得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低关税。英德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兰比(Ivo Nicolai Lambi)谈到:1856年至1860年,德国向英国输入的粮食达到英国进口粮食总额的25%。^①

“半外围区”是“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中转站,一方面吸纳“中心”输出的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则向“外围”转移技术并输出自身的商品和资本。德国在积极拓展对英贸易的同时,也在向那些比自身更加落后的地区积极输出商品和资本,并着手构建自己的殖民商业体系。美国史学家科佩尔·平森(Koppel Pinson)谈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的资本输出也以在南北美洲、近东和远东的大规模投资的形式进行”。^②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则谈到:从19世纪后半期至1914年,“德国虽然是后起者,一直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国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1页。

戴维·兰迪斯:《1750年至1914年西欧的技术变迁与工业发展》,载[英]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页。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67页。

同注,第419页。

同注,第68页。

同注,第384页。

同上,第333页。

同注,第16页。

[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二分册:早期铁路时代》,姚曾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① Ivo Nicolai Lambi,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Germany, 1868-1879*, Wiesbaden: Fritz Steiner Verlag, p. 20.

^② [美]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范德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14-315页。

内工业发展,但也在海外投资了220亿至250亿马克,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十五分之一。”

5. 德国的经济“起飞”

英国与普鲁士的同盟关系,使德国获得相对安定而温和的外部政治环境,而以英德双边贸易的发展为先导的英德经济一体化进程,则促使德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速。1815年普鲁士获得莱茵河左岸领土、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这一连串事件成为推动德国经济走向起飞的里程碑。根据罗斯托的测算,德国经济在1850年后步入起飞阶段,1873年以后进入“走向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全面工业化的阶段。

整个19世纪,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其邻国法国。法国工业革命的起步比德国早,经济“起飞”

的时间比德国早,建立海外殖民体系的时间也比德国早;然而在整个19世纪,法国在人均工业化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上领先德国的优势逐渐丧失,最终在20世纪初全面落后于德国,以至于金德尔伯格将法国称为世界经济体系中“永远的挑战者”。究其原因,恐怕与两国外部政治环境的差异,特别是两国与19世纪霸权国英国的关系的差异密切相关。与普鲁士1815年至1870年间相对平和而有利的政治环境相反,此时的法国时时处处遭遇英国的掣肘,致使法国的殖民体系难以扩展,海外贸易一再遇挫。可见,政治结构对经济关系影响深远,普鲁士在英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中相对较弱的地位,其在“半外围区”的独特位置,是德国工业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先决条件。

表1 1830年至1913年德国与英、法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

项目	国别	年份							
		1830年	1840年	1850年	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1913年
国民生产总值 (以1960年价格 计算的10亿美元)	德国	7.2	8.3	10.3	12.7	16.6	19.9	26.4	49.8
	英国	8.2	10.4	12.5	16	19.6	23.5	29.4	44.1
	法国	8.5	10.3	11.8	13.3	16.8	17.3	19.7	27.4
钢铁产量(千吨)	德国	50			400		2470		17600
	英国	690			3880		7870		7787
	法国	270			900		1730		4687
综合工业实力 (以1900年时英国 的实力为100)	德国	6.5			11.1		27		137.7
	英国	17.5			45		73.3		127
	法国	9.5			17.9		25		57.3

资料来源:1.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9、90页上面的数据。

2.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上面的数据。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罗斯托认为,衡量一国经济是否进入“起飞阶段”,应测量三个条件:(1)总投资是否达到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2)制造业是否有一种或多种部门发展极快,迅速成长;(3)是否出现了与现代工业化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社会与制度结构,能够使经济充分利用现有之生产要素而迅速增长。根据这三项标准,罗斯托将德国经济的“起飞”时间定为1850年至1873年。参见[美]沃尔特·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7页。而蒂利则认为,罗斯托将1850年定为德国经济起飞的年份,并不准确,1840年至1850年间德国境内的铁路建设全面展开,带动工业各部门的连锁增长,因此德国“起飞”的年份应是1840年,参见蒂利:《19世纪德国的资本形成》,载[英]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英国、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

罗斯托将法国经济的“起飞”时间定为1830年左右,而奇波拉等人则认为应该更早,其起飞时间应该定于1800年以前,参见[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6页。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00)》,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7页。

三、结语:对“半外围区”起飞之路特点的归纳

德国(普鲁士)原本只是欧洲的二流国家,夹在已经走向工业化的西欧和依然停留于农业社会的东欧之间,其工业发展水平与瑞典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相仿,并非真正的欧洲强国。然而,随着世界政治的第二个霸权体系,即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德国(普鲁士)凭借自身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建立起与霸权国的结盟关系,进而通过这层结盟关系,在霸权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继而利用其重要地位,获取霸权国优先提供的资源和机遇,从而实现自身的经济“起飞”。

从宏观角度审视,特定国家的经济能否实现“起飞”,以怎样的方式“起飞”,并非单纯由各类经

济要素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外部国际政治结构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关系。具体言之,一国的地缘战略位置、“起飞”时的外部政治环境、及其外部经济环境,是塑造一国经济“起飞”的基本路径的三项环境要素,这其中,地缘战略位置是重要的基础要素,是将外部政治环境和外部经济环境融合为统一整体的连结点,能够反映出后两者的特点与结构。通过考察这三项基本要素,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一国经济得以“起飞”的宏观结构背景。

图2 塑造“半外围区”国家“起飞”路径的三项环境要素的相互关系



表4 对德国赖以实现“起飞”的三项环境要素的考察

被分析之对象		德国(普鲁士,1815年至1870年)
供分析之项目		
地缘战略位置	自然地理位置	欧洲中心,是欧洲内部不同地理区域的交汇处
	安全战略价值	介于法、俄两大国之间,其变化可同时影响法俄两国
“起飞”时的外部经济环境	“中心-外围”结构的时代特征	英国主导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
	与霸权国的经济关系	通过双边贸易和英国对德间接投资,实现英德经济一体化
	与“外围地区”的经济关系	德国对东欧、东南欧和非洲的贸易不断发展,源于英国的工业技术经德国向上述地区扩散
	在“中心-外围”结构中的地位	处于“半外围区”,介于发达的西欧和落后的东欧、东南欧之间
“起飞”时的外部政治环境	霸权秩序的时代特征	欧洲形成列强制衡的均势格局,即“维也纳体系”
	与霸权国的政治关系	通过1815年的《四国同盟条约》,与英国结盟
	与霸权国共享的共同战略利益	阻止法国重新强大,制约俄国称霸野心
	在霸权秩序中的地位	是英国制约法、俄两国、维持欧洲均势的支柱性盟友

分析德国走向起飞时的国际政治结构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分层结构中,各部分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活力是不一样的。“半外围区”中那些具有重要的安全战略价值的国家和地区,最容易与霸权国结盟,获取结盟而带来的机遇与资源,因而其

实现“起飞”的机会最多,工业化进程的速度最快,经济发展的空间最大,成为整个“中心-外围”结构的“枢纽”之地。这些“枢纽”之地在霸权体系中的位置,与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其实是相互巩固、互为因果的。正是这些“枢纽”之地,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富有活力、最具有经济增长潜力的地方。

责任编辑:戴启秀

analysiert. Es wird gezeigt, dass die Linke vor allem auf Grund ihres blackmail-Potentials als relevant zu betrachten ist. Dabei sind die Auswirkungen auf die SPD am stärksten. Sie muss sich entscheiden, ob sie bei ihrer gemäßigten Mitte-Links Positionierung bleibt oder in Konkurrenz zur „Linke“ wieder weiter nach links rückt. Koalitionstheoretische Überlegungen zeigen, dass der Umgang der SPD mit der „Linke“ entscheidend für die Chance der SPD ist, zukünftig den Kanzler stellen zu können.

Die chinabezogene Antidumping-Praxis der EU: Drei Grundtypen und Grundprinzipien

Dai Qixiu

Betrachtet man die chinabezogene Antidumping-Praxis der EU in den letzten Jahren, kann man feststellen, dass die EU seit der Gründung des Binnenmarktes nach folgenden drei Behandlungsverfahren und Prinzipien die chinabezogenen Antidumping-Fälle behandelt hat, nämlich nach dem Staat mit der *Marktwirtschaft*, mit der *Nichtmarktwirtschaft* und mit der *besonderen Marktwirtschaft*. Daraus sind drei Grundtypen, drei Behandlungsweisen und drei divergente Ergebnisse abgeleitet. Auf dieser Grundlage versucht die vorliegende Arbeit die chinabezogenen Antidumpingfälle der EU mit dem Ziel zu typisieren, das Interpretieren und das Wahrnehmen der recht komplizierten Antidumpingfälle der EU gegenüber China zu erleichtern. Des Weiteren wird auf die grundlegenden Faktoren, die häufig angeführten Argumente und die Verfahrensweisen der EU eingegangen.

Die Gesetzgebung der Lebensmittelsicherheit in Deutschland und Aufschlüsse für China

He Lihang

Die vorliegende Arbeit wendet sich der Gesetzgebung zur Sicherheit von Lebensmitteln in Deutschland zu. Angesichts der Situation in der Lebensmittelsicherheit in China sollten die diesbezüglichen Erfahrungen von Deutschland für China von großer Bedeutung sein. Im Artikel analysiert die Verfasserin die Probleme in der chinesischen Praxis der Gesetzgebung zur Überwachung der Lebensmittelsicherheit und stellt mit Rücksicht auf deutsche Erfahrungen einige Vorschläge auf.

„Abflug“ der „Semi-Peripherie-Zone“

der Weltwirtschaft am Beispiel von Deutschland

Xin Hua

Die „Zentrum-Peripherie-Ordnung“ in der Weltwirtschaft und die hegemoniale Ordnung in der Weltpolitik binden sich, begründen sich und integrieren sich miteinander. Die „Knotenpunkte“, die die „Zentrum-Peripherie-Ordnung“ und die Weltpolitik verbinden, bilden relevante Staaten und Regionen in der „Semi-Peripherie-Zone“, die vom

sicherheitsstrategischen Stellenwert sind. Diese „Knotenpunkte“ sind unter anderem Verbündete von Hegemonialmächten, die sich zunutze ihrer speziellen Position in der Hegemonialordnung eigenartige wie auch vorzügliche Lebensräume und Entwicklungschancen angeeignet und dabei leichter als andere Länder den wirtschaftlichen „Abflug“ verwirklicht haben. Seit dem Zeitalter der großen Meeresfahrten sind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in der Folge drei hegemoniale Systeme vorgekommen. In dem zweiten Hegemonialsystem hat Deutschland durch die eigenartigen Chancen und Räume, die sich aus den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Weltordnung boten, sehr schnell den wirtschaftlichen „Abflug“ verwirklicht. An diesem Musterbeispiel im deutschen Industrialisierungsprozess zeichnet sich deutlich das dynamische Modell eines Zusammenspiels zwischen der „Zentrum-Peripherie-Ordnung“ und dem internationalen Hegemonialsystem ab.

Die soziale Verantwortung der Unternehmen und ihre Einflüsse auf die deutsche Unternehmensführung

Sato Takahiro (Japan)

Das amerikanische Verständnis von der sozialen Verantwortung der Unternehmen ist stark individualistisch-liberal geprägt. Die Art und Weise, wie Unternehmen ihre soziale Verantwortung wahrnehmen, ist mit dem Eigenkapital eng verbunden. Die Eigenartigkeit des deutschen Verständnisses von der sozialen Verantwortung der Unternehmen besteht darin, dass Unternehmen einerseits nach ihren eigenen Interessen streben, andererseits die Interessen von Beteiligten schützen und balancieren. Die soziale Verantwortung der Unternehmen entsteht auf der Basis der sozialen Erwartungen und mündet schließlich ins eigenartige Modell der deutschen Unternehmensführung.

Die Investition deutscher Unternehmen in China unter dem Aspekt der Standorttheorie

Yang Qian/ Feng Xiao/ Zhu Yanyuan

Infolge der Intensivierung der bilateralen Wirtschafts- und Handelsbeziehungen nimmt die Investition deutscher Unternehmen in China permanent zu. Der erste Teil des vorliegenden Artikels widmet sich der Darlegung der Investition von in China angesiedelten deutschen Unternehmen. Danach werden relevante Einflussfaktoren der FDI anhand eines Standortentscheidungsmodells analysiert. Mit Hilfe dieses Modells und in Hinsicht auf Sektoralverkopplungen lassen sich bedeutende Standortanforderungen von Ansiedlungsunternehmen eruieren. Aus den Standortanforderungen einerseits und Standortgegebenheiten Chinas andererseits wird schließlich die Entwicklungstendenz der Investition deutscher Ansiedlungsunternehmen in China gefolgert.